

课程与学校教育的政治学

THE POLITICS OF CURRICULUM AND SCHOOL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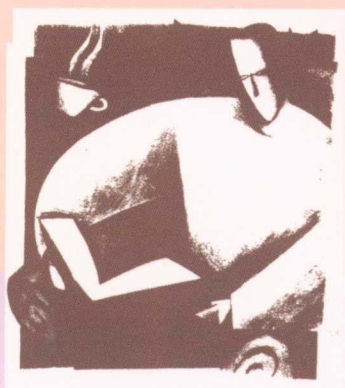
——历史的视角

HISTORICAL APPROACHES

[英] 艾沃·古德森 著

IVOR GOODSON

黄 力 杨灿君 等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课程与学校教育的政治学

——历史的视角

[英] 艾沃·古德森 著
IVOR GOODSON

黄 力 杨灿君 等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出版人 所广一
责任编辑 刘明堂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课程与学校教育的政治学：历史的视角 / (英) 古德森著；黄力等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 - 7 - 5041 - 7335 - 5

I. ①课… II. ①古…②黄… III. ①学校教育 - 研究 - 世界 IV. ①G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5479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 - 2013 - 5418 号

课程与学校教育的政治学——历史的视角

KECHENG YU XUOXIAO JIAOYU DE ZHENGZHIXUE——LISHI DE SHIJIAO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419

传 真 010 - 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国民灰色图文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9 毫米×239 毫米 16 开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10.75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48 千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译序：古德森教授学术思想介绍

特纳在其风行全球的理论教科书《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中，有关“理论的本质”的论述在不同版本之间有着非常微妙的变化，前几个版本还洋洋洒洒地谈理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从第七版开始，特纳的态度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径直宣称“理论是有关事件怎样和为什么发生的故事”。因此，社会学理论就是有关人类如何行为、互动和组织自身的故事”^①。

如果我们认可特纳这一“理论观”的话，认可理论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种叙事的话，那么我们了解某一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提出这一理论的理论者有所了解，我们有必要知道这位理论者到底是谁，他有什么样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经历。对于古德森教授的《课程与学校教育的政治学——历史的视角》这本书来说，情况也不例外。下面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古德森教授的生活史与学术史。

古德森教授出身劳工阶层，并且毫不避讳这一事实，反复强调劳工阶层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研究的基本立场：为学校教育场域中处境不利的学生和老发出声音，并不断努力揭示出造成教育场域中弱势群体不利处境和不公正待遇的社会历史与微观政治原因。与一般的教育研究者不太一样，古德森教授不仅有着教育学领域扎实的学术训练和理论基础，也有经济学和历史学方面严格的学术训练，更有着近十年的中学一线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

^①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M]．邱泽奇，张茂元，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

出身劳工阶层的古德森教授认为教育曾经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所以他想帮助更多的劳工阶层子弟也能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因此，1968年，古德森教授放弃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辞去金斯顿大学讲师职位，决心不再从事与自己生活和兴趣无关的学术研究，不再为富家公子和千金们服务，毅然决然地去了一所综合中学任教。他相信在新兴的综合中学中，来自弱势阶层的学生将和来自强势阶层的学生受到同等的待遇，他希望自己在综合中学中能帮助更多的来自弱势阶层的学生。在任教的过程中，古德森教授产生了许多关于学校教育实践的困惑。概括地讲，就是为什么即便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对不同社会阶层出身的学生一视同仁，学生也几乎同样努力的情况下，劳工阶层子弟的学业依然不如中产阶级与强势阶层子弟优良，劳工阶层子弟在学校中的处境依然不容乐观。古德森教授认为除了伯恩斯坦的“编码”理论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揭示的原因以外，社会历史建构出来的学校课程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却经常被忽视的原因。于是，古德森教授在任教近十年之后，毅然再次放弃拥有的一切，到年轻的苏塞克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英国中学课程的“社会史”，即一门课程是如何经过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和斗争而最终取得官方认可的合法地位的。古德森教授凭借对中学课程形成的社会历史机制的出色研究不仅顺利拿到博士学位，更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古德森教授的博士论文中文版由南京大学贺晓星教授等翻译并于2001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环境教育的诞生》。

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数年间，古德森教授从事了一系列关于课程的社会史研究。与以往课程研究要么侧重社会建构要么侧重历史演变的研究取向不同，古德森教授的课程研究很好地将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视角结合起来，尤其是侧重微观历史的考察。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将课程的社会建构与历史发展中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博弈，以及围绕有限社会资源之间的斗争完整而清晰地揭示了出来。因此，在国际课程学界，古德森教授有着广泛的学术影响力。曾任国际课程学会主席的威廉·派那教授称古德森教授为“当今课程领域最重要的一位学者”。美国出版商 Sense Publishers 2009 年出版了两本和古德森教授

课程研究有关的著作，一本是《课程研究领域的领导者》^①，另一本是《全面、深入而智慧的理解：课程研究中的生活史与生活政治——威廉·派那与艾沃·古德森教授的对话》^②，这两本书都将古德森教授在课程领域的研究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正是凭借着在课程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古德森教授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短短六年就成功地获得了正教授的职位。

在课程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之后，古德森教授的学术焦点开始转移到一个很当下的实践问题上：为什么全球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的、以提高学校效率以及满足不同社会阶层群体教育需求为目标的课程改革与教育改革大部分都失败了？围绕这一问题，结合自身的学术视角和实践经验，古德森教授开始关注教育改革中的教师问题。在考察以往有关教育改革的研究的过程中，古德森教授注意到了教师这一被以往研究忽略的角色。在古德森教授之前，大量的有关教师的研究停留在宏大叙事的水平上，试图通过对教师角色的设定标准等一系列应然性的研究来解决教师在教育改革中的不适应的实际性问题。这种理论应然和实践实然之间的巨大脱钩，导致了教师研究缺乏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关怀。古德森教授通过引进生活史视角，在研究中将教师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予以展现。在教师生活史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从教师的视角了解到教育改革背景下教师的生存状态，了解到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的人在教育实践中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与困惑。从教师生活史视角出发，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什么那些以市场化为底蕴的旨在提高学校教育绩效和课程标准化的改革大部分都失败了。可以说，教育政策制定者对教师考虑的不充分和教育理论研究者对作为最主要教育实践者的教师的忽视是改革失败的最根本原因。“生活史”理论在教育改革和教师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推进之后，古德森教授将生活史理论在方法论层面进行了提升与规范，并发现了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叙事与学习的关系。目前古德森教授正在进行的欧盟课题就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开展的。

① Edmund C. Short, Leonard J. Waks. *Leaders in curriculum studies* [M]. Rotterdam; Boston: Sense Publisher, 2009.

② José Augusto Pacheco. *Whole, bright, deep with understanding: Life story and politics of curriculum studies: In-between William Pinar and Ivor Goodson* [M]. Rotterdam; Boston: Sense Publisher, 2009.

通过以上对古德森教授学术研究轨迹的非常粗线条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古德森教授是一位实践意识非常强烈的理论研究者。他的所有研究可以说都是围绕着一个很明确的实践问题而展开的。简单介绍完作为理论“研究者”的古德森教授之后,我想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一下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古德森教授。

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古德森教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1968年,在即将完成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博士论文和拿到哲学博士学位之际,伯恩斯坦的一篇论文《开放社会》将他彻底“解放”了,他放弃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与金斯顿大学的讲师职位,可以说几乎放弃了一个劳工阶层子弟在学校里近十年刻苦奋斗所获得的一切。古德森教授觉得这些东西远离自己的生活世界,远离自己的人生理想,远离自己的思考兴趣,他想做一点和自己的生活相关的、和自己的兴趣相关的、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意义相关的工作,因此,古德森教授到了伦敦教育学院接受教师资格培训继而到综合中学任教近十年。

在中学任教近十年后,古德森教授带着自己在实践中遭遇的困惑和阅读的理论积淀来到苏塞克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本来可以凭借自己出色的博士论文留在苏塞克斯大学任教,但1978年“不满的冬天”却改变了古德森教授的人生轨迹。古德森教授热烈支持的轰轰烈烈的工人罢工运动最后以失败草草收场,这使他对英国撒切尔政府开始有点心灰意冷,碰巧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能提供一个职位,古德森教授便携全家远赴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任教。之后,他在西安大略大学开展了一系列原创性的出色的课程领域的研究,并在该校获得正教授职位。对于欧美学界而言,加拿大还是处在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于是在学术上取得一系列学界公认的研究成果之后,古德森教授转战美国,在纽约罗切斯特大学华纳研究生院谋得一份教职,领着十分优厚的教授薪水。2001年,令古德森教授讨厌的“保守的右派”小布什当选总统,于是,古德森教授再次毅然放弃“美国的薪水”^①,回到自己“英国

① 林语堂的人生新四大快事:“领美国薪水”,“住英国乡下”,“吃中国美食”,“娶日本太太”。

的乡下”。一开始在东安吉利亚大学任教，后来转战布莱顿大学。布莱顿是苏塞克斯郡的首府，是古德森教授获得博士学位、结婚和自己唯一的儿子安德鲁出生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不仅是古德森教授现实的家乡，更是古德森教授精神的家园。

以上我们对古德森教授的学术经历与人生经验的大概介绍，我认为可以用以下四句话来概括：劳工阶层的社会出身让古德森教授始终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发出声音；实践意识让古德森教授的研究始终关注教育改革与实践的一线问题；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学术训练让古德森教授能以更宏观和细腻的理论视角来审视教育实践；作为性情中人的古德森教授的研究充满了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色。

这种鲜明的个性特色体现在古德森教授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首先就是古德森教授的著作大部分采取了历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综合性的研究视角一方面取决于古德森教授自己受到的学术训练，另一方面也与古德森教授研究的教育实践这一主题密切相关。这种研究视角将教育实践的历史生成与社会互动以及教育场域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博弈与斗争完整地揭示了出来。

我曾询问古德森教授历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优势体现在何处，他这样答道：第一，人的行为不仅受社会情境的制约，更是受到历史经历的影响；不仅是社会建构的，更是历史生成的。他很推崇布迪厄“惯习”这一概念，他认为这一概念很好地说明了个体行为的历史生成。第二，任何宏大叙事都无法代表处在弱势地位的个体的声音。因此，我们必须让教师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必须了解教师的生活史。第三，个体不是被动接受一切制度的制约和指导，而是有着自己思想和偏好的能动者，如果某一制度和政策不受行动者的内心认同，那么行动者就肯定会以各种策略来抵抗这一制度与政策。

这种鲜明的个性特色还体现在古德森教授的语言风格上。古德森教授的论著行文风格比较晦涩，行文中大量涉及社会科学各个不同研究领域的专业词汇。我曾半开玩笑式地问他为什么论文语言风格如此晦涩，弄得论文有点

像伯恩斯坦的“局限编码”，非内行不能看懂也。他这样回答笔者：“我曾经在学校里因为语法和用词不够得体受到老师的批评，今天，我要用最好的词汇和语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一点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风格比较接近，并且，布迪厄也是劳工阶层出身。或许，童年那些学校教育中不太愉快的生活经历让这些思想家终生难以忘却。

高 政

2013年4月

目 录

译序：古德森教授学术思想介绍	1
导论 课程与学校教育之研究	1
第一章 课程变革的危机	7
第二章 文化发明的脉络：学习和课程	24
第三章 课程史之需要	40
第四章 变革过程和历史阶段：一种国际视角	51
第五章 变革理论的发展：教育变革的各种浪潮	63
第六章 审思教育改革：教育中自传研究的贡献	94
第七章 倾听职业生涯的故事	114
第八章 学校教育、课程、叙事与社会的未来	126
参考文献	142
艾沃·古德森近年来的主要著作	158
译后记	160

导论 课程与学校教育之研究

1997年，我回到故乡英格兰工作。回乡的欣喜之余，我便计划写几本总结我教育思想的著作。但这一计划却由于我那时获得了两项重大的科研项目而未能启动。第一个项目名为“学习生活：人生历程中的学习、认同与能动”（Learning Lives: Learning, Identity and Agency in the Life-Course）。这一项目是英国政府的教学与学习项目的一部分，由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资助，旨在理解人生历程中各种境遇变化中的学习，并采用生活史的方法来获取资料。

还有一个是为期四年、由欧盟（立项）资助在八个欧洲国家展开的关于“职业知识”（Professional Knowledge）的研究。依然采用的是生活史方法。

因此，在2009年以前的这些年里，有关学习、课程与生活政治的研究就扎根于这两项极具生命力的项目。希望这些主题最终能够获得更大的关注，也能表达得更为清晰。

我的大多数研究都持有这样一个信条，即：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社会与政治，就必须理解个人和人生经历。这一观点虽然平常，但是却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极为有益的视角来审视教育。最近，整个西方社会，有关教育和社会变迁的著作以及类似的政府创新行动，大多有意无意地忽视关键人物的个人使命与人生轨迹。这种忽视常常给支持者和专业人士实施“符号行动”提供证据，实际改革的成效却远不及形式的宣传给人的印象深刻。有时，一开始以符号形象呈现出的目标导向（targets）、绩效考核（tests）以及各种数据

表格等能够赢得广泛支持，后来却证明，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其效果常常并不明显，或者甚至是与最初宣传的形象背道而驰。矛盾之处便常是对个体使命及人生经历的忽视或否认。这些正是我们在本研究一开始（而不是在研究结束时）就进行积极定位（也确实是我们的研究策略）的一个良好的切入点。

在一些著作中，我探讨了学校教育中的科目是如何成为“不变的给予”（timeless givens）的社会政治过程。事实上，“传统科目”转而成为“传统发明”的例子，一如在其他许多社会领域中的那样屡见不鲜。长存于学校教育及课程领域的传统，必须要获得强有力的“支持者”，没有这样的支持，各种新的挑战就永远不会受到牵制。因此，传统的学校科目都能与外部有力的支持者保持最大程度的协调。致力于帮助那些更为弱势群体的各种课程建设，必定会受到有势力的外部支持者的“恶毒攻击”。所以，学校课程的稳定性是与外部支持者的认可程度相对应的。

在笔者的第一本书《学校科目与课程变迁》（*School Subjects and Curriculum Change*）中^①，我就注意到了控制与结构、机制与调解之间的区别。这是要说明，有关课程的任何断言都必然受到我们所讨论的历史阶段的制约。一定意义上，新结构的建立，就是为了运行新的“游戏规则”。同时，新结构的确立也可视作是控制，而新结构确立之后的阶段则是调解。我们将在本书的前几章提到，20世纪60年代及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大多数西方国家进行社会改革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使命与社会运动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正义与促进社会包容。在前几章我们会提到，这些社会使命与社会运动引导出致力于扩展社会包容的严肃的教学及学校教育实验。对于这些新的教育活动，我的观点是，不去争论它是否为实现社会包容的那些永远捉摸不定的方案提供了什么答案，而是要去描绘那些作为这一社会运动之组成部分的各种目的、各种教学以及教育实践。在最近的一个阶段，“社会包

^① 中译本《环境教育的诞生》，贺晓星、仲鑫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译注

容”再次浮出水面，但这次是以教育机会分层化的策略出现的，是一种孤立的教育政治学用语。由于这一用语对于早期的实验与社会运动了无兴趣，所以，很难相信它有严肃的目的。学校为情境惯性所累，以至于完全忽视历史，这样的做法既幼稚又自欺欺人，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不明智的，也是盲目的。

但事情不仅于此。世纪转折之际许多事情与撒切尔 1979 年当选以及里根 1980 年当选后的阶段发生的巨大变化与逆转类似。例如，英格兰 1904 年的中等教育结构与 1988 年的“国家课程”之间的相似性极为明显。我注意到，1904 年的结构表明，提供给文法学校学生的那些课程与在寄宿学校中以及为劳动阶级开发出来的那些课程是正好相反的。在这一点上，主流利益群体明显在厚此薄彼。“二战”后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的那些年，追求更为平等的力量创建了综合中学，使得所有阶级的孩子都能平等地在一个屋檐下学习。正如我们先前所关注到的，一些新的课程改革试图重新定义并挑战文法学校课程以及社会特权阶层的联合模式，正是为了击溃这种挑战，撒切尔政府的失误才不断暴露出来，“国家课程”便是一例。在不断寻求挑战与修正这些变革及其意图的过程中，政治右派主张恢复“传统的”（如文法学校）科目。国家课程可看作这些政治集团利益与意图取得胜利的政治宣言。某一特定的观念、国家某一特定的被喜好的部分因此得到重新恢复并被置于优先地位，正如以“国家”的名义合法化一样。

课程构型的变化给我们提供了考察社会与政治的意图及目的的试金石。当社会力量的平衡和基本经济的发展经历周期性变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构型的变化。在“改革大潮”中，利用斯宾塞基金项目“长期变革”所获取的大量的档案资料，我试图描绘出教育改革的长周期。看一下美国和加拿大，课程与教学之变革的主要“局势”都有着明显的相似性。追求社会公正的类似模式在英国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及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也可见到。所有的学校都受到进步愿望的影响而努力去建设一个以社会包容及社会公正为特征的“伟大社会”。一些学校（如后面几章提到的综合学校）追求“彻底的”革命性变革，另一些学校则在更为常规的学校教育场域中追求实

现社会包容。

前面提到的逆转模式，同样也适用于在标准化考试与系统分化新模式（如“磁石学校”，Magnet Schools）推广后的教育场域。这是改变学校教育的世界运动的组成部分，常与世界新的经济秩序的出现相关联。一些评论家将之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其围绕着学校效率与择校等概念，带来一种竞争性的商业气氛。学校教育的这种积极的市场化有许多含义，其一便是使得各类课程之间的争斗显得没有意义。由课程带来的生涯机会的差异，被积极地转交给了市场，市场根据特殊的学校地理位置与系统来分配资源，这些位置与系统越来越与各种模式的居住地相对应。

20 世纪末期剧烈的社会与政治变革，在教育方面体现为上述教育变革，这对那些有意对此进行研究的人们发出了挑战。作为生涯机会的一种分配装置以及绩效考核、目标导向、图表数据的突出表现者，课程不断变化的地位形态已经改变了社会及政治行为的焦点。因此，我们必须反思这一转变，并对我们研究的问题与采取的方法进行重新的思考。

一开始我便主张，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社会与政治，那我们须得去理解个体与人生经历。就研究焦点及方法的选择而言，没有什么比生活史的适当性更真实的了。我曾试图去表明“我来自哪里”，而这正体现了一种鲜明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有助于社会包容与社会公正的斗争。我也曾试图为理解社会的可能性提供一种历史的背景。20 世纪 60 年代及 20 世纪 70 年代达到顶点的霍布斯鲍姆（Hobsbawm）^①所说的平等主义黄金时代很明显已经过去，在他的记述中也明显呈现出了一些个人的怀旧之情。（Hobsbawm, 1994）但我确实在力图避免及警惕自己对黄金时代的怀念，正如拉斯（Lasch）曾提醒我们的：怀旧是对记忆的放弃。（Lasch, 1979）因此，我应该记下黄金时代的几个神话。包括学校在内，许多公共服务系统开发出了这样一种文化，它有利于服务的提供者而非接受者，而工会有时还会激化这一问题。像其他

① 霍布斯鲍姆，1917 年生，荣誉勋爵，不列颠学会会员，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译注

团体一样，公共的和专业的团体也会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去争夺资源，而一味地放任，各种进步的实践会发展为松懈、无责任以及专业的自我膨胀。在许多方面，1970年代英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案例，这一案例最终结束于弥漫在工人及工会“不满的冬天”（winter of discontent）^①的氛围中。而正是在这种氛围里，撒切尔政府粉墨登场。

对20世纪70年代冲突的挖掘、责任的归因及事由的描述，是史学家们正在进行的工作。本书观点的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在最近的各种改革与重建之前，公共服务系统的所有事情都不是它应该的那个样子。最好的专业人员在提供社会包容方面采取一种“关怀的职业主义”（caring vocationalism）的态度的同时，我们也能见到许多自私的专业主义（self-serving professionalism）的例子。我们的任务是，一如既往地，不但去试图理解更广阔的社会改革运动，也试图去理解个人生活史中的具体的体现和嵌入。

本书从一开始就力图关注这一焦点，并在后面的几章对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政治”这一焦点进行方法论以及本质论的讨论。我相信，新的世界秩序的形成使得“生活政治”比我们提到的先前那些时期要显得更为重要。这种情形，一部分来自“个体化社会”的凸显——与之前相比这个社会显得更加“个体化”，在这种情境下，个体的生活政治成为社会争夺的场所。理解社会变革的焦点曾经体现为集体性的社会运动，如学校或课程改革，而现在，理解社会变革的主要策略应聚焦于个体的生活政治。

正如里夫斯（Reeves）所说：

个体正逐步取代集体而成为政治行为、政治分析以及政治冲突的场所。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变得更自私，而是自我正成为比阶级或团体更重要的部

① 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自上任以来，一直主要以控制劳工阶层的薪金加幅来解决长期的通货膨胀问题，而且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卡拉汉在1978年决定继续限制薪金加幅在5%或以下。可是，这次工会却不再妥协，反而对政策做出了激烈反对，以期得到更高的加薪幅度，在1978年至1979年间的冬天，英国出现了一连串的工业纠纷和大罢工，使市政服务陷于停顿，经济处于混乱状态，史称“不满的冬天”。——译注

分。这部分的是由于生活方式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而既有的投票模式正在被打破。更重要的是，稳定的政治归属正在持续地解体。因此，1997年，工党比保守党赢得了更多中产阶级的选票。这既不是一个进步也不是一个倒退，这仅仅是个事实。

结果之一是，一位有经验的政治观察者称之为“愤怒的个体化”的出现。人们会很愤怒，但一般是作为个体而非团体的愤怒。过去我们有愤怒的贾罗游行^①（Jarrow marchers），现在我们有个体的路怒症；过去我们有多势众的工会，现在我们有技术精湛的专家。许多正在进行着的争斗——例如，工作与生活，饮食节制与饱食终日，好的与差的养育方式——正是在个体内部展开的，而不是在个体之间进行的。（Reeves, 2004, pp. 23-24）

本书的后面几章采用生活史的方法来理解社会世界。生活故事、叙事与完整展现的生活史的重要区别是：故事或叙事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情境。正是在这些历史情境下，个体的生命才能得以展开与嵌入。我们叙述我们生活史的故事情节和话语（scripts），与当下特定的历史阶段的条件及可能性是相关的。因此，重要的是要发展出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理解和呈现不断变化的历史背景。

^① 1936年10月，为了抗议政府在大量的失业与极端的贫困面前的不作为，200名来自英国东北部小镇贾罗的工人从贾罗游行至伦敦的国会大厦，全程近500公里。这是英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游行，也是最失败的一次，政府仅仅花了200英镑就将这群游行工人打发回去——每人1镑回贾罗的火车票钱。——译注

第一章 课程变革的危机

我在此宣誓。宣誓。以我的……名誉？我的信仰……对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而言是紧迫、不断增大、紧迫、急切需求的科学革命的信仰。我自己对变革、为变革而变革的信仰。

并不是任何时代都需要变革……即便变革在当时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出路，但其时机或许并不适合变革（Sheehy, 1981, p. 99）。

在欧洲历史上，变革的“必要性”一直是这样的一种强制，一直把那些事实上是多余的、愚蠢的、悲剧式的东西正当化了。变革的倡导者应该总会遭遇到一个顽固的以为什么开头的反问，这到现在已然成为一项原则。虽然都是以小写字母“c”开头^①，但这并非保守主义，而是一个常识。我们应该记住，之前我们曾多少次处于此种境地。[《卫报》（*The Guardian*）社论，1998, p. 24]。

本章首先针对变革必然是合情合理的观点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在西方国家，这一观点似乎是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看法。我们的质疑针对这样一种假设，即认为变革运动通常包括各种进步的和包容的要素。我们主张，应该对各种变革力量的历史脉络进行仔细的审视，然后才能对它们所具有的进步或退步的本质进行评判。

大多数课程变革发生在特定的地区环境中，但有时，这些变革确实是由

①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与常识（common sense）均以字母“c”开头。——译注